

|我|们|的|国|家|
历史与文化

樊树志◎著



历史与文化

樊树志 撰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目录

一、“天下为公”的传说时代 / 1

远古先民从哪里来？	/ 1
迈入生产经济阶段	/ 3
从黄帝到尧舜	/ 5
从“天下为公”到“天下为家”	/ 8

二、青铜时代的文明 / 13

华夏——中国	/ 13
殷墟的考古发现	/ 15
瑰丽而神奇的青铜器	/ 17
甲骨文——文明的标志	/ 19

三、“封建”与“礼乐”的和谐 / 21

“封建”的本意——“封邦建国”	/ 21
周公“制礼作乐”与礼乐文明	/ 24
孔子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	/ 28

四、秦汉帝国体制 / 32

始皇帝——中国第一个皇帝	/ 32
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折中主义	/ 34
帝国体制的强化	/ 36

五、三国鼎立与魏晋风度 / 43

三国何时鼎立? / 43

打着“禅让”幌子的篡立 / 45

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 / 48

六、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 / 54

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 / 54

“天可汗”的太平盛世 / 56

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 / 61

七、盛唐气象 / 66

“忆昔开元全盛日” / 66

对外来文化的宽容 / 68

南无阿弥陀佛 / 71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 / 73

八、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 / 76

“杯酒释兵权”与文官体制 / 76

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/ 78

巅峰状态的科学技术成就 / 82

九、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 / 85

“元祐党籍碑”的由来 / 85

从“靖康耻”到“绍兴和议” / 88

杭州——世界之冠的大都市 / 93





十、蒙元帝国的威名 / 97

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	/ 97
忽必烈与大元大蒙古国	/ 99
黄道婆的革新与乌泥泾的奇迹	/ 103
关于马可·波罗的争议	/ 105
“中国的第谷”——郭守敬	/ 108

十一、儒学熏陶下的义门与家训 / 111

朱熹与儒学复兴	/ 111
肃穆治家的义门	/ 113
修身齐家的格言	/ 117

十二、“以重典驭臣下”的朱明王朝 / 121

朱元璋与皇权的强化	/ 121
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	/ 124
李善长的灭门之祸	/ 127
“诛十族”、“瓜蔓抄”及其他	/ 129

十三、面向海洋的时代 / 137

郑和下西洋	/ 137
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	/ 141
耶稣会士跨海东来	/ 143

十四、晚明的改革与党争 / 146

“嫌怨有所弗避”的张居正改革	/ 146
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驂乘”	/ 149
东林书院与东林党	/ 152

十五、明清鼎革之际的国家与社会 / 159

复社与《留都防乱公揭》 / 159

崇祯：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/ 162

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/ 166

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？ / 169

改朝换代与士大夫气节 / 173

十六、从康熙到雍正 / 176

政策的转换：由制裁到笼络 / 176

康熙的武功与文治 / 180

雍正的建树 / 184

十七、盛世的面面观 / 188

鼎盛时期的经济 / 188

盛世中的衰败迹象 / 190

色厉内荏的盛世 / 194

十八、封闭的天朝 / 197

海外贸易的由禁到放 / 197

闭关——广州一口通商时期 / 199

马嘎尔尼与阿美士德出使中国 / 201





一、「天下为公」的传说时代

远古先民从哪里来？

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，是指人类的历史，而不是自然界的历史。既然是人类的历史，那么开宗明义要说的第一件事——人类自身的起源，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由于时间久远，可以凭借的考古发掘资料极为珍稀，人类起源这个话题，至今依然聚讼纷纭，很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。正如西方学者常说的话：“我们知道的，就是我们不知道！”（We know that we don't know!）

1939年古人类学家魏敦瑞（Franz Weidenreich）撰写的《东亚发掘的最早现代人类》指出，山顶洞人的三具头骨，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——原始的蒙古人种、美拉尼西亚人种及爱斯基摩人种。对此，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发问：中国本土

人种的主干——智人中的蒙古人种又是从何起源的呢？

经过几十年的探索，我们大致可以知道，由猿到人，经历了直立人、早期智人、晚期智人的过程。就中国而言，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谋人、蓝田人、北京人、和县人等，已知的早期智人大荔人、金牛山人、丁村人、许家窑人、马坝人等，已知的晚期智人（现代人类）有柳江人、资阳人、山顶洞人等。

对于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，有些学者提出挑战，他们认为，地球上的人类统统起源于非洲，中国也不例外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原先知道的，又变得不知道了。

近二三十年来，国际学术界有些人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，提出一种假设：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假设愈来愈言之凿凿：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，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的后代，他们离开非洲，扩散到欧洲、亚洲等地，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，成为现代人类的祖先。八九年前，中国的分子生物学家也发表论文，宣称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七万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，并且推论：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，然后来到中国。这些学者认为，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，早已灭绝，他们并非中国现代人类的祖先。

于是，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。

这种“单一起源论”虽然甚嚣尘上，却遭到了“多区起源论”者的质疑。“多区起源论”认为，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，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。中国的古人类学家指出：在中国大地上，已经出土的直立人、





早期智人、晚期智人（即现代人类）的化石表明，其间存在明显的连续进化，东亚的蒙古人种并非来自非洲；与这些古人类相当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，前后连续，并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，因此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，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。更何况，根据化石年代测定，华南的柳江人生活在距今七万年至十三万年之间，说东亚人的祖先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迁移而来的，岂不成了无稽之谈！一位古人类学家说得好：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，无论如何是间接的，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。

目前看来，试图推翻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这一结论，倡言中国人起源于非洲，似乎仍嫌证据不足。

迈入生产经济阶段

距今一万年左右，远古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。它与旧石器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，磨制石器取代打击石器，随之而来的，农耕、畜牧和陶器相继出现。这些现今看来极其普通的事物，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发明。在此以前，远古先民以采集、狩猎来维持生活；在此以后，人们不再是食物的采集者，而是食物的生产者。把野生植物驯化为人工栽培作物，把野生动物驯化为人工饲养的家禽家畜，为人类提供了可持续的食物来源。这是意义深远的变革，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农业革命，是毫不为过的。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，人类的生活方



式开始变化，由逐水草而居进入到定居的状态，半穴居式房屋的构建，陶器的烧制满足了生活的需要，野生蚕驯化为家蚕，引来了原始的丝织业。在这种经济基础上，草创的社会制度得以形成，人类离开文明的门槛愈来愈近了。

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，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到一万二千年，农业出现在近东的两河流域。他们推论，中国的某些农作物是由两河流域传入的。真的如此吗？

1960年代末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华裔学者何炳棣，在他的著作《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》中，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，中国农业的起源，具有自己的区域性和独立性，并不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。这一结论，一再被考古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所证实。

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，出土了谷物加工的工具——石磨盘、石磨棒，据测定，它的年代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，表明当地在此之前已经栽种粮食作物了。河南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表明，距今七八千年前，中原地区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，有房基、灰坑、陶窑，还有农具——石斧、石铲、石镰，粮食加工工具——石磨盘、石磨棒。

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历史也很悠久。1992年，中国和美国科学家联合研究江西的稻作起源。他们的研究报告证实，长江中游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先民，在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食物，至晚在距今九千年前，人工栽培的稻作农业已经出现。

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一万二千年前的五粒炭化稻



谷，被誉为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谷。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，令人震惊。它是一个稻谷、稻秆、稻叶、谷壳的堆积，一般厚度20~30厘米，最厚处超过100厘米。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，谷芒挺直，隆脉清晰可辨。经鉴定，它们是七千年前人工栽培的晚稻。

2000年出版的《稻作、陶器和都市的起源》（严文明、安田喜宪主编）一书指出：新石器时代早期，先民对稻谷种子反复选择，改变了野生稻的生存条件和遗传习性，初步驯化成功，基本形成原始栽培稻。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，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——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，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。

从黄帝到尧舜

中国远古时代，有三皇五帝的传说。三皇有六种说法，其中之一是：伏羲（太昊）、女媧、神农（炎帝）。五帝有三种说法，其中之一是：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。所谓“皇”和“帝”，其实是后人对他们的尊称，当时不过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。

神农氏就是炎帝，他所领导的部落发明了农耕、医药、陶器。中国古代典籍《易经》和《白虎通》说，神农氏用树木制造耕具——耒耜，教导民众农耕。《史记》和《淮南子》说，神农尝百草，用草药治病救人。《太平御览》引用《周书》说，神农在发

明农耕的同时，发明了陶器。

《易经》说：“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舜氏作。”可见黄帝稍晚于炎帝。黄帝从北方到达黄河流域时，已经是拥有六个部落的巨大部落联盟了。黄帝领导的部落的发明，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。后人的传说是这样的：

——冶炼铜矿石，铸造铜鼎、铜钟。十二个铜编钟，和以五音，可以演奏音乐；

——四处观察天象，编制历法，确定春夏秋冬四季，按照季节变化播种百谷草木；

——利用树木，制造车船，便于交通运输；

——栽桑养蚕，用蚕丝编织衣料，制作衣裳。衣裳不仅有御寒的功用，而且带有社会政治意义，这就是文献所说的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、“以衣裳别尊卑”。

黄帝领导的部落联盟有姬、西、祁、己、滕、蔚、任、荀、僖等十二姓。祁姓有传说中的陶唐氏，就是唐尧所属的部落；黄帝的后裔夏后氏，是夏朝建立者；姬姓是黄帝的嫡系，是周朝的建立者。人们把黄帝尊奉为华夏民族的始祖，是名副其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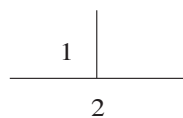
从黄帝到尧、舜、禹，持续了几百年，他们以黄河流域为中心，吸收周边的夷人和羌人部落，结成新的部落联盟。这种部落联盟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，成为地缘关系的共同体。在这个共同体中，地域、财产和权力都是公有的，并非某一个领袖私有的，这就是所谓“天下为公”，或者叫做“大同之世”。

共同体内部，由各部落首领组成议事会，协商重大事务，推举联盟的领袖。尧、舜、禹就是由联盟议事会民主推举，而成为





1. 汉画像石中的神农氏形象
2. 黄帝战蚩尤图





领袖的，由于他们出于公心，治理有方，被后世赞誉为圣贤。

根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描述，尧是一位圣明领袖，他发现舜精通农耕，善于制作陶器，有领导才能，确认舜可以托付重任，便培养他参与摄政。尧年老时，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承人选问题，让各部落首领讨论，大家一致推举舜。尧便把权力移交给舜，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。这就是所谓“传贤不传子”。舜觉得自己德才大大逊色于尧，谦辞不就，避居别地。由于各个部落首领一致拥戴，舜才返回，担任共同体的领袖。舜继位后，征得联盟议事会的同意，任命八元管土地，八恺管教化，契管人民，伯益管山林川泽，伯夷管祭祀，皋陶管刑法。舜到了晚年，鉴于禹治理洪水有功，联盟议事会一致推举禹继任领袖。禹也谦辞不就，避居别地，在各部落首领一致拥戴下，才继承了舜的权位。

这就是古人津津乐道的“禅让”。关于“禅让”的传说，至迟在春秋时代已经见诸记载，不独儒家，墨家、道家、法家都有涉及，可见它绝非某一学派的伪托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，远古时代权力的移交，是“禅让”而不是世袭，是有历史依据的事实，并不是虚构的。

从“天下为公”到“天下为家”

这种“选贤举能”的“禅让”时代，孔子把它称为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之世”。至于他推崇备至的“大同之世”，是个什么



1	2
	3

1. 尧 (清人绘)
2. 舜 (清人绘)
3. 东汉武梁祠画像石大禹像





样子，没有明言。依据《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》等古籍的描述，大概是一个共同生产、共同消费的社会，在一个叫做“里”的基层社会，有八十户人家，选举年高德劭的人担任“父老”，能说会道、身体强健的人担任“里正”。春夏秋三季，百姓外出耕种，“父老”和“里正”负责监督，出去晚了，或者收工回来没有随手带点薪柴，都要受到批评。到了冬天，父老在“校室”里，教育儿童；里正则催促妇女从事纺织。日常生活中，长期保持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助”的友好互助风尚。《韩诗外传》说：一个里巷的八家不分彼此，八家互相保护，出入轮流看守，疾病相互照顾，患难相互救助，青黄不接可以互通有无，宴会相互招呼，婚姻大事共同商量，捕获的猎物共同享受，大家都受到仁爱和恩惠，因此，民众之间和睦、亲爱、友好。

在儒家典籍中，把夏朝建立之前称为“大同之世”，是一个“天下为公”的时代。《礼记·礼运》引用孔子的话，这样描述“大同”：

孔子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举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，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”

意思是说，从前大道盛行的时候，天下是公共的，选举贤能的人来掌权，讲信用，修和睦。所以，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亲人，



不仅仅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，使老人得以善终，壮年人发挥作用，幼年人得以成长，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抚养。男人各有职责，女人适时婚嫁。反对糟蹋财物，也不必据为己有；厌恶不尽力而为，也不必把能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。因此，不会有阴谋，不会有盗贼，大门可以不关。这就是大同。

禹年老时，在联盟议事会上讨论继承人选，众人推举皋陶、伯益。禹却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启，暗中培植启的势力。禹死后，启杀死伯益，继承父亲的权位，于是出现了“家天下”的夏王朝，开启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。孔子把它称为“天下为家”的“小康之世”，他这样说：

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力为己。大人世及以为礼，城郭沟池以为固，礼义以为纪。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，以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，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，以考其信，著有功，刑仁讲让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执者去，众以为殃。是为小康。

意思是说，如今大道已经消失，天下被一家一姓据为己有，人们只亲爱自己的亲人，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，财产权力为自己所用。统治者世袭已成为常规，用城墙沟池巩固统治，把礼义作为纲纪，端正君臣关系、父子关系，使兄弟和睦、夫妇和谐。在此基础上，设立制度，划分田里，表扬勇知，功劳归于自